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强 文 学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历史系,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 要: 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 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 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防御辽和西夏, 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 北宋中后期, 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 乡兵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 北宋; 禁军; 乡兵; 边境防御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北宋兵制, 军队分为三种, 禁军、厢军和乡兵。禁军和厢军是国家的正规军, 属于募兵, 乡兵则是地方民兵部队。“选自户籍, 或土民应募, 在所团结训练, 以为防守之兵。”^①北宋中后期出现的蕃兵, 是少数民族乡兵。北宋乡兵的设置和发展, 比较明显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北宋前期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 这一时期乡兵的规模较小, 地位也较低。第二个阶段是在北宋中后期, 自仁宗朝始, 至北宋末, 北宋乡兵大量增置, 其数量和分布范围空前扩大, 乡兵在国家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自唐末五代以来, 征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 而乡兵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征兵制的某些特点。北宋前期沿袭五代制度而保留了少量的乡兵, 但一直都废弊不堪。宋夏战争爆发后, 由于正规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 庞大的军费开支又令北宋政府难以负担。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 乡兵由于寓兵于农, 开支较小, 加之其来自乡土, 熟悉地理, 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北宋政府通过授予田土或赏赐财物在西北地区招募的弓箭手、蕃兵以及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征募的乡兵, 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 成为北宋中后期防御西夏与西南少数民族袭扰的中坚力量。

一、北宋前期的乡兵

唐代中期以后, 均田制瓦解, 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随之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唐末五代, 中央集权衰微, 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在这一时期,

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央王朝、各藩镇及以后形成的割据政权, 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 都倾其全力招募军队。然而, 长期频繁的战乱使得各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其所能提供的赋税收入十分有限, 远不能满足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募兵队伍的军费需求。另一方面, 战祸所导致的人口大量流移和伤亡, 使得可招募的兵源也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对征兵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 乡兵开始出现了。唐末五代时期, 地方藩镇及割据政权多有征发乡兵的情况, 但乡兵的军事作用十分有限。后周建立后, 在北方沿边地区设置有乡兵。后周广顺年间(951—954), 西北地区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有保毅乡兵(亦称保毅弓箭手); 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有弓箭手; 瀛州(今河北河间县)、霸州(今河北霸县)等地有强壮。后周所置乡兵, 数量很小, 在军事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北宋立国之初, 因袭后周遗制, 保留了沿边地区乡兵的设置, 后来又有所扩大和增补。宋太祖时, 后周所置保毅、强壮、弓箭手等乡兵大都被保留下来。其后, 在太宗和真宗两朝, 北方宋辽战争不时爆发, 西北党项首领李继迁又起兵反宋, 北宋承受的军事防御压力很大。为加强边防力量, 北宋在这些地区又陆续增补和创设了不少乡兵。在宋辽边境的河北二路与河东路, 除原有的强壮乡兵得到增补外, 还设置了神锐、忠勇、忠顺、强人、义勇等乡兵, 在西北与西夏政权毗邻的陕西诸路与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强文学(1976—), 男, 汉族, 甘肃靖远人,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历史学硕士, 研究方向: 宋史、清代货币史。

河东路，除原有的保毅乡兵得以扩大规模外，又增设了义勇、弓箭手、强人、强人弓手、寨户、义兵等乡兵。在南方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也陆续设置了一些乡兵。川蜀诸路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路有弩手、土丁，广东、广西路有枪手、土丁和壮丁，广西路的邕、钦州有溪峒壮丁等。

北宋前期各名目的乡兵，大多数规模都比较小，一般在几千人左右。数量最大的是强壮和保毅乡兵。北宋前期的强壮乡兵的数量史无记载，但根据宋仁宗康定初统计的数字及当时的征籍方式，宋真宗时，河北、河东地区的强壮数量当不下 20 万人。^{[1]卷 190，《兵志》四}陕西的保毅乡兵在真宗咸平五年（1002）时人数最多，达到 68775 人。^{[2]兵一之一}北宋前期乡兵，其征募之制不甚完善，在编制、训练、给赐及戍防制度上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乡兵的作用只在于本地防拓，军事意义不大。这是因为北宋早期禁军战斗力尚强，无须突出乡兵的地位。边境爆发战争之时，乡兵亦只令城守。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乡兵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仅有河北强壮一例。真宗咸平六年（1003）五月，朝臣奏请在河北沿边使用“强壮备城”，^{[3]卷 54，咸平六年五月乙卯}以弥补禁军守御之缺。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契丹大兵入寇，宰相寇准请“募强壮入敌境，焚毁旅帐，讨荡生聚”。^{[3]卷 57，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朝廷从其议，诏：“河北吏民有集强壮杀契丹者，令所在援之，仍颁赏格。”^{[3]卷 57，景德元年闰九月乙卯}是年十月，契丹攻瀛州城（今河北河间县），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3]卷 58，景德元年十月己酉}契丹军攻城十数日不能下。在这次战斗中，强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宋辽澶渊之盟订立后，“放强壮归农”。^{[3]卷 58，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此后，北宋的北方边境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而乡兵的措置也开始寝废。到仁宗初期，“神锐、忠勇、强壮久废，忠顺、保毅仅有存者。”^{[1]卷 190，《兵志》四}

二、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北宋时期，禁军是国家的正规军。在宋太祖、太宗两朝，其战斗力尚强。澶渊之盟后，国家承平日久，军政颓弊，禁军虽然数量庞大，但“可战之士，十无二、三”。^{[3]卷 146，庆历四年二月丙辰}元昊称帝，宋夏战争重起。北宋在西北沿边屯驻九十万大军，冀望制服西夏，但事与愿违，正规军低下的战斗力和将帅的怯懦无能使得宋军在西夏军队面前屡战屡败，一触即溃。此时，北宋朝廷被迫调整防御政策，起用范仲淹等人，在西北地区逐渐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攻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乡兵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愈益为朝廷和沿边将帅所重视。

北宋乡兵多分布于河北、河东和陕西沿边各路，南方亦有一定数量的乡兵。这些地区由于和少数民族相邻，加之历代边疆战争频繁，因而民风强悍，惯于战斗。乡兵的战斗地域多在本地，熟悉山川道路，适应气候条件，

能耐寒暑，较之“东兵”具有明显优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知制诰王拱辰言：“昨奉使时，闻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兵。盖天资勇悍，乡关之城，人自为戡，不费粮廩，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仁宗于是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2]兵一之三、四}这些“材力伉健，武艺精强，战斗为士卒先”的乡兵，其军事价值逐步为朝廷上下所认识。^{[4]卷 325}直至北宋末期，乡兵亦是一支战斗力较高的军种。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朝廷危急。臣僚上言：“天下步兵之精，无如福建路枪仗手，出入轻捷，取得其术，一可当十，乞选官前去召募。”^{[1]卷 191，《兵志》五}正是因为乡兵具有这些优势，所以北宋中期以后不断有朝臣建议沿边地区以乡兵代替禁兵戍守。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种世衡在青涧城招募蕃兵，朝中就有人建议在沿边“募熟户，给以禁军廩赐使戍边，悉罢正兵”。^{[1]卷 191，《兵志》五}熙宁年间，“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1]卷 192，《兵志》六}王安石认为：“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则可渐复，至于二广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害于仁政。陛下诚移军职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兵，则事甚易成。”^{[1]卷 191，《兵志》五}这基本体现了北宋中期以后朝廷对乡兵的政策，即仍然保留禁军作为常备军，而逐渐扩大乡兵的数量，提高其地位，使其能战能守，而后再裁损禁军中的冗兵，以减少军费开支，这在当时是比较合于实际的。

北宋乡兵的发展壮大是从仁宗朝开始的。北宋政府根据当时宋夏战争的特点，在西北沿边建立起一条以乡兵为骨干的防御屏障，配以纵横交错的大小堡寨，基本扭转了北宋在战争中被动的局面。正如苏轼所言：“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1]卷 190，《兵志》四}这一时期内，弓箭手成为对付西夏军队的重要力量。种世衡知延州，“尝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由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1]卷 335，《种世衡传》}义勇也是北宋沿边一支重要的乡兵部队。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建请于陕西诸路点刺义勇后，“于是三路乡兵，唯义勇最为盛。”^{[1]卷 190，《兵志》四}至神宗熙宁九年（1076），河北、河东、陕西诸路义勇总二十四万多人，足见其数量之多。蕃兵在这期间亦发展成为乡兵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蕃部益众，而弓箭手多蕃兵矣。”^{[1]卷 190，《兵志》四}神宗元丰以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朝廷以裁减募兵所省廩给，转为民兵征募、教阅之费。

随着乡兵数量的增加以及战斗力的提高，北宋政府在廩赐、教阅、役戍等方面都相应提升了乡兵的地位，

使其与正规军的差别逐渐缩小。神宗熙宁九年诏：“环、庆寨户、强人弓手如禁军法，上兵籍，隶于马军司，其廩给视中禁军。”^{[3]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庚戌}蔡挺任陕西沿边经略使时，加以整顿乡兵，“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廩、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1]卷191，《兵志》五}有丰厚的支赐，又不离乡土，这使得乡兵得以保持较高的战斗力。神宗以前，乡兵还负担相当重的科配和差役，这就造成广大乡兵“重苦番教”的状况。神宗熙宁年间以后，朝廷倚重乡兵沿边戍守，对乡兵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减免。熙宁四年，“诏罢陕西路义勇差役”。^{[1]卷191，《兵志》五}义勇除备边御敌外，“不得擅便勾抽役使”。^{[2]兵二之七}对于私役乡兵的官吏，“并论如《私役禁军敕》”。^{[1]卷191，《兵志》五}这样，乡兵的地位才有了实际的提高。

三、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上升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也是当时北宋所面临的国防形势所决定的。

首先，在边境地区大量措置乡兵可减少禁军驻扎的数量，这符合宋朝一贯的军事驻防策略。北宋承五代格局，政治中心东移，北失军事天险长城，致使来自北方辽朝的威胁成为其心腹之患。随着宋王朝与党项政权矛盾的发展，宋王朝边防大大延长，需驻守的军事地区急骤增多，但北宋自立国始就采取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措施，将“守内虚外”定为国策，对辽和西夏主要采取消极防御，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为了防御辽夏，宋王朝不得不在北方沿边增置大量禁军，这与其强干弱枝的既定国策相悖。乡兵数量虽众，但分布区域广，力量分散，易于政府控制，又能弥补禁军守御之缺，故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其次，北宋王朝巨大的募兵费用是导致乡兵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北宋正规军数量的庞大，在历代是绝无仅有的。北宋前期，军队数额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共有军队 378000 人，其中禁军为 193000 人。太宗至道年间，共有军队 666000 人，禁军为 358000 人。真宗天禧年间，共有军队 912000 人，禁军为 432000 人。仁宗时，宋夏战争爆发，军队数量大增，至庆历年间，全国已有军队 1259000 人，其中禁军为 826000 人。军费开支成了北宋政府最沉重的经济负担。英宗治平四年（1067），张方平在上疏中说：“利害安危之体，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今中外诸军坐而衣食，无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恬然不图营救。”^{[3]卷290，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丙午}于是，裁减冗兵，降低军费开支成为北宋朝廷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而乡兵寓兵于农，军费需求较小，有利于缓解北宋政府的财政压力。

再次，北宋在边境地区设置的部分乡兵，依托修筑的大量堡寨，亦屯亦戍，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军粮供应的压力。唐末五代，由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

化，加之军阀长期割据混战以及吐蕃军队的大肆寇掠，西北地区满目疮痍，农牧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人口数量也大幅下降。宋夏战争之初，西北驻军的军粮供应主要从内地调运，而西北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粮食运输更加困难。其间北宋所组织的几次大的进攻战役，往往都因粮运不继而告失败。朝廷虽然实行了支移、折变等办法来增加西北的粮食供应，但收效不大。正如尹洙所说：“西师之兴几一岁矣，为守计，则师无还期，坐耗廩粟。又边税所入不广，当有转输之劳，若乘以饥凶，民困于内，兵失于外，非策之善也。”^{[5]卷3，《攻守策头回歌传一首》}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主持西北军务后，为解决这一难题，开始推行屯田政策。北宋在西北地区的屯田，除了正规军屯田和移民屯田外，更普遍的是利用弓箭手、蕃兵（主要是蕃弓箭手）和寨户等乡兵进行屯垦。哲宗元符年间，吕惠卿上言：“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若耕其半，则两路新寨兵费，已不尽资内地。”^{[1]卷176，《食货志》}神宗朝以后，由于西北乡兵屯垦的有效实施，宋夏战争的战略优势已逐渐向宋朝一方倾斜。

最后，北宋中后期乡兵战斗力的提高也是其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北宋中后期在西北沿边地区措置的以弓箭手和蕃兵为主的招募制乡兵和西南地区设置的乡兵，由于计口授田等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待遇优厚，其编制、教阅制度较为严格，故而战斗力较高，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奇效。北宋中后期，陕西诸路“恃弓箭手为国藩篱”。^{[6]卷156，《兵考》八}神宗时，赵鼎在延州招募的蕃兵人马，“因训练以时，精锐过于正兵。”^{[1]卷332，《赵鼎传》}西南地区的乡兵“分隶边寨，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寇，遣使袭讨，官军但据险策应之。”^{[6]卷156，《兵考》八}北宋一代，在边防战略上一直实行重北轻南的政策，西南边疆驻防禁军很少。西南地区历次少数民族叛乱的平定，几乎都借助于乡兵。乡兵“施之西南，实代王师，有御侮之备，无馈饷之劳”。^{[1]卷191，《兵志》五}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置的乡兵在北宋中后期对付西夏以及加强在西南民族地区统治的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北宋中后期维持边境地区稳定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 [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 [4]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1987.
- [5]尹洙.河南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1987.
-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